

DOI: 10.19832/j.cnki.0559-8095.2020.0012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盲人摸象”的隐喻

——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

王利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 天津 300350)

“环境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一人一个见解，百人百种说法，或许永远没有统一标准答案，但是并不奇怪。^① 回顾史学史可以发现：许多世代以来，史家一直都在追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学是什么”？至今纷纭聚讼，莫衷一是。历代史学家重复追问同一问题显然并非愚笨，亦非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历史包罗万象。一切事物都有历史，此刻之前都已成为历史，历史几乎就是一切。历史学并非凭着若干技艺即可毕其功业并且一劳永逸的学问，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守成开新的千秋志业，并且必然产生各种不同知见。只要人类尚存，历史探索就不会止步；只要人类遭遇新的挑战，

收稿日期：2019-12-30

作者简介：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环境史；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灾荒史、灾害文化、生态文明；滕海键，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经济史。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13&ZD080)、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专项“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之建构”、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科普工作”专项“中国当代环保史记编纂和资料整理研究”(0747-1561SITCA037)中期成果。

① 美国环境史学界关于“什么是环境史”林林总总的见解和说法，可集中参阅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新史学命题和分支也就不断产生。

与其他诸史不同,环境史家不愿囿于“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藩篱。他们跨出人类社会,进入其他生命世界乃至无机界,了解以往知之甚少的自然。这并非跨界猎奇或逐时邀功,而是履行历史学家固有职责: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即是两大基本历史关系之一,历史学家有义务进行系统解说。然而这一主题变更,不仅意味着转换思想方向,还要求扩大学术视野,改变研究方式,重组学术资源,开展综合研究。于是它不仅被认为是一种新史学,更被特别贴上了两个重要标签——“多学科”和“整体史”(首先是环境史家自命)以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多学科”是手段,“整体史”则是目标,至少是重要目标之一。但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和实现,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这里略谈几点粗浅意见供同道批判。

一、“整体史”期待与现实困境

对历史学家来说,动辄声明“多学科”甚是无谓。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本是统一整体,过去的一切都统归于历史,包括人类史和自然史。历史学家并无专属领地,其唯一思想边界是“当下”与“过去”之间那条不断移动的界线;除了纵深性,历史学方法并无其他特性。过去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一切学科的方法都有可能被运用于历史研究,它原本就是多学科的。早在中国近代史学创立之初,就有史家指出史学是“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①

人类自从拥有自我意识,开始分辨物我,就以不同方式认知世界,而重视对以往经验的整理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漫长时代中,人们主要通过经验直觉和内心感悟来认识世界,模糊性和整体性同时存在,而史学对思想知识曾经具有很大统合性。近代以来,产业、职业分化促进了学术分工,“分科治学”成为主流,学科、专业不断分化,认识世界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也愈来愈多样化,在推进人类认识不断细化和深化的同时,亦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割裂,包括自然与历史分离,原本博综天人的史学逐渐遭到肢解,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警惕和批评;^②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斯诺更批评“两种文化”分离造成巨大鸿沟。^③

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方面不断被分割,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融摄,各类专史如同雨后春笋勃发,条块析分的历史成为主流,只有极少数雄心勃勃的大历史学家如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才有胆量全景地展示过去。直到最近一个时期,“全球史”“大历史”开始受到青睐,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长期变化、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方面,环境史是它们的堂兄表弟。

环境史研究的初始目标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缘何发生,人们曾经怎样试图阻止,因此最初主要探研环境保护史。随着研究不断展开和深入,环境史家逐渐改变命意,图谋透过人与自然关系的长期变化更加全面地认识过去。跨越“两种文化”鸿沟,桥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环境史家来说既是一个思想进路,也是一个学术意愿。^④他们想把自然与人类两大系统的众多因素、现象和问题,以及探究这些

^① 清末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陈黻宸就指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参见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677页。李泰棻亦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参见李泰棻《中国史纲》,武学书馆1922年版,第8-19页。

^② 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去的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页。

^③ 西方思想界包括环境史学家对“两种文化”割裂的弊病讨论已久。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斯诺的批评经常被学人提及,国内学界亦时有评述。参见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④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onald Worster, “The Two Cultur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No. 2, 1996, pp. 3-14.

因素、现象和事实的众多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统一的叙事框架和解说体系,其综合性和整体性意图是毋庸置疑的。经验丰富的《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的主编们说道:

环境史包含分析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各种方法。通过将物理和生物过程视为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哺乳动物、鸟类、植物、细菌和病毒构成了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生物因素。非生物成分和过程——例如,气候变化、土壤成分、水力和大气化合物在环境史家眼中也很重要。在人类领域,经济制度、人口规模、消费模式、政治制度、对种族和性别的态度以及对自然的看法,都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系统的互动。^①

但环境史家并不能统御整个历史认知,至少迄今尚未具备这种能力。事实上,当他们一脚跨出传统史学的门槛,就立即掉进无边的泥淖,遇到无数的歧路。英国学者詹·奥斯托克(K. Jan Oosthoek)感慨地说:环境史“几乎囊括所有过往并且如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切”“存在着太多可能探询的路线”,而环境史的整体性更令人不胜负荷。他说:

环境史可以成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点,它把科学推理与哲学批判联结起来,把物理世界与思想世界联结起来。环境史可能接近法国年鉴学派所谓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历史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历史”。然而通过尝试这样做,许多历史学家体验到一种不安甚至恐惧的感觉,被过去的声音、力量、事件和关系的嗡嗡作响的混乱所吞没,同时也被动态变化的自然环境所吞没,几乎无法看到任何一致的理解。环境史的整体性可能会给我们留下一个看似难以驾驭的负担,那就是试图写出一部“万物的历史”,但这也是一种挑战和希望。我们没有创造自然或过去,两者都是简单存在的,是我们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的任务是团结在一起理解这一切。^②

不论是研究个体还是团队,环境史家都不可能完全讲清“万物的历史”,更不可能探明以往人类与自然交往的一切,只能对他们所接触到的部分寻求片断认识。而在那些部分所发生的问题,既可能是物理、化学、生物、气候问题,也可能是经济、哲学、政治、民俗问题,或者兼而有之。如此一来,环境史的“整体”只是无数零散问题的胡乱堆积。

环境史家批评以往史学忽视自然,造成历史认识残缺,期待(或被期许)撰写一部“整体史”,志向可谓高远,现实却很尴尬。按照设想:环境史学的工作区间在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互相作用的界面,但古往今来,界面随着人类前行和自然退却不断向四裔、六合、八荒推展,究竟多远多大,并无定制;它期待采用一副新的历史视镜,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平台,提供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和解释体系,但视阈多宽?境界多高?凭借怎样的“工具箱”?统统都没有说清。国内同仁不愿看到环境史被黜降为一种专门史,但至今它还未能被列入国家学科名录。

当下的实际境况是:无论我们的理想多么高远,一旦从抽象意愿进入具体实践,立即就发现自己没入了无边无际的林莽或泥淖之中。这既因环境生态问题具有空前广域性甚至全域性,亦因每位学者的时间、精力终究都有限,还因长期“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能力和知见。即便是一位健康长寿的通才,又岂能具备全科知识、通天彻地、无所不能呢。每位研究者终究只能从具体问题做起,努力在自己所擅长的方面有所贡献;任你何等博学通识,面对环境史的辽阔天地,都将如同“出于崖溪,观于大海”,望洋兴叹,自惭形秽,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好比“井蛙”“夏虫”。^③眼界局限如此,何敢侈言“整体史”?然而倘若放弃“整体史”追求,沉没于动物、植物、河流、土地、气候……史实(人与自然关系史上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众多领域学者早就分别开展了大量研究,“环境史”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

^①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4, Introduction.

^② Oosthoek, K. J. W. (1999, 2009), *Environmental History-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www.eh-resources.org/environmental_history.html.

^③ 《庄子外篇·秋水》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参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63页。

二、“盲目摸象”的认识论隐喻

突然想起国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一则寓言——盲人摸象。

这是一个奇物的故事，通篇明喻的句子，整体上却是一个关于局部性认识与整体性认识关系的绝妙隐喻，或可借以思考令人烦恼的环境史学整体性问题。《大般涅槃经》云：

……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敕已，多集众盲，以象示之。时彼众盲各以手触，大臣即还而白王言“臣已示竟。”尔时大王即唤众盲各各问言“汝见象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茱萸根”；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绳”。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亦非不说。若是众相悉非象者，离是之外更无别象。善男子，王喻如来应正遍知，臣喻方等大涅槃经，象喻佛性，盲喻一切无明众生。^①

故事寓意是说：无明众生认知能力有限，只能感知事物的片断而不能明了其整体实相。由这个寓言产生的成语——盲人摸象，常被国人用于批评认识事物以偏概全，但是遗漏了寓言所蕴含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观念：众盲人都未能了解和说明大象整体，却分别触摸到了它的局部而非一无所知，各人对局部的感知和说明都是真实的。若非如此，也就没有整体的大象了。换句话说：整体实相固难认知，局部事实却可以把握；离开了局部，整体亦不复存在。

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认知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任何认知对象都自具其复杂性——小到一人一物，大到地球宇宙，谁敢夸口自己明了一切呢？面对“什么是环境史”的质询，我们就如同盲人被询问“什么是大象”？熟悉本领域学术史同仁都知道：大象曾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明星动物，从徐中舒、文焕然、何业恒到伊懋可，多位著名学者做过研究。仔细思量起来，考察这类具有历史生态标志意义的陆地最大野生动物，环境史家遇到比寓言中盲人们更大的处境：其一，盲人触摸的大象是其当下的实在，而环境史研究的大象却是早已远遁、不能复归的过去存在；其二，盲人只需说明大象本身，而环境史家还需说明它们的历史生境包括山林、湿地、气候、天敌……及其时空变化；其三，环境史家更重要的工作是解说人类与大象之间在成千上万年中曾经发生的许多记载模糊、纠缠不清的故事及其前因后果：从获象、服象、象耕、象战、象舞、象鼻炙、大象复仇，到如今屡禁不绝的非法猎象和国际象牙贩卖……一物之历史尚且如此复杂，万物的历史又当如何？谁敢说奥斯托克所表达的不安、恐惧、混乱和被吞没感只是故作危言呢？

如之奈何？我们认为：若想摆脱上述困局，首先必须从基本概念出发，准确地说明“什么是”，其次要辩证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然后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厘清思想进路。

仍以颇受环境史家重视的大象为例。对这类曾在广大区域徜徉觅食的野生动物，不同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有着甚不相同的认知。如今，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它具有特殊的物理结构，包含众多的化学成分，拥有独特的遗传基因、细胞、器官、组织，还有不同于任何其他物种的呼吸、摄食、消化、分泌、排泄、排遗、生殖……本能，内在的自然物性（天性），决定它只能在特定生境（包括气候、水土、植被……诸多条件）中栖息，虽然这个庞然大物少有天敌，但仍有可能因感染某种病毒或细菌而死亡；当其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发生纠葛从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更是具有万花筒般难以历数的面相。如今有人在觊觎它的牙齿并关心其市场价格，有人在追寻它不断撤退的历史过程和原因，有人在考察其对特定社会交通运输的影响，还有人阐释它在佛教造像中的地位，以及其他文化象征意义……总而言之，认识不断推展，不断深入。然而不同研究群体之间没有共同关怀，也没有共同话语。谁能告诉我们：何者才是大象（从历史到现在）的真实相？

^①（北京）天竺三藏县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三〇《狮子吼菩萨品第二十三之六》，精缩新版《乾隆大藏经》第三十册，第550-551页。

环境史家为此类问题感到焦虑不安,或许只是庸人自扰,因为认识总是由局部向整体渐进的。正如每位盲人毕竟获得了关于大象的部分认知——不管它“如莱茯根”“如箕”“如石”“如杵”,还是“如木臼”“如床”“如瓮”“如绳”,终归反映了部分真实;环境史家从各自擅长的问题入手,只要坚持不懈,终将通过真切地认知众多局部而逐渐了解更大的面相。只是对于自期和被特别赋予“整体史”责任的环境史家而言,如何有效推进思想知识整合,显得更加迫切。

盲人们的偏差在于他们仅仅触摸到很小的局部便做出结论。近代以来的分析科学对于深化认识功不可没,缺陷在于治学分科过甚导致思想知识碎化,缺少必要的联结和整合。我们不能放弃对局部的深入探索而回归于前近代的整体模糊,而应当以分析科学成果作为基础,加强各个局部的彼此关照,寻求更高层次的整合,特别是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的思想知识会通。

关照、整合和会通并非简单归拢,而是必须在找到问题症结、确定核心关注和建立合理逻辑框架的前提之下进行,有时需要回到一切问题和现象发生的原初。仍从大象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基于何种目标开展研究,都必须肯定它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形式,其腹、背、鼻、耳、口、眼、牙、足、尾特征,构成了其整个躯体的样貌,是各个部分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这是它的基本属性。离开了这些基本属性前提,不管从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还是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都将无法理解由大象所衍生的各种事象。

三、从基本概念出发认识生命网络

当下中国环境史研究最紧要的,并非先验地确定它究竟是“整体史”还是“专门史”,而是厘清基本概念、找准核心问题并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叙事、解说框架,避免杂乱无章地堆积材料和罗列事实,甚至以环境史名义把其他领域相关成果简单汇集在一起而无任何新发现。

由于跨越自然与社会两界,环境史学的认识空间在理论上应比其他史学分支更具综合整体性,在实际中必定遭遇远为众多的专业性难题,受困于线索枝蔓、歧路遍生,从而难以辨别主要方向。因此,必须时时紧扣环境史学主轴——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度解构和全面把握环境史的三个主要概念,即人、自然和关系。

承认自然因素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并使“自然进入历史”,无疑是环境史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然而同样重要并且首先需要重新确定的是人类自身的地位。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人,他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地球生命演化的结果,永远依靠自然界而存活。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一切历史创造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①让“人类回归自然”,从自然界中发现人,是环境史学的另一重要转向。环境史家必须首先询问人是什么?进而追问人之所以为人者何?赖以生存者何?然后才能探明人之施加于自然者何?何以人要对自然界施加那些影响?人是现知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其复杂程度可与整个宇宙相提并论。自然界的复杂性,在思想认识上根植于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并且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过程之中不断显现。

作为人类劳动和认识对象的“自然”,在不同视阈和语境中具有不同内涵和外延,通常所见:有人类身体内在的自然(人的肉体组织和生理特性),有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外部条件(不论好坏)的自然(环境),还有人类不曾扰乱甚至尚未发现的自然。在完全人工建造的世界(例如现代国际大都市)中,自然仍以不同方式显示其存在的力量。由于环境史学的命意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进入环境史叙事和思考的那个自然,应指自然界中与人类实践活动(至少是认识活动)发生了某种关联的部分,即通常所说的“环境”。环境史中的环境是人的环境;环境史中的生态是同人类生存有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的众多有机和无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以及在相互作用影响下的人类生存状态。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所有环境问题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没有人就无所谓环境生态问题;愈来愈多的环境生态问题是由人类造成的。正如人类是历史的存在,自然、生态、环境等等也都是历史的概念。

根据主题设定,环境史既非自然史亦非人类史,至少不单纯是大自然或者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史,因此关系分析是环境史研究的根本要义。在具体研究中,一些学者着重考察物理关系(如地震、水土流失),另一些对化学关系(如化学品污染)更加在行,还有人对其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更感兴趣。但最根本的关系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界及其众多因素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亦即人类社会各个方面与自然整体、局部和万物之间的生命联系。生命联系既不是单向也不是双向,而是极其复杂、多维立体的生命网络。一切形式、各个层次的关系,都以生命作为关系建构的核心,以生命作为网络编织的节点。因此,环境史学是一种生命史学,应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伴随人类生命活动不断展开,人与自然界各种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生命关系网络不断张开,如今几乎覆盖整个地球生物圈,其形态、结构和功能是极其复杂和富于变化的,不可简单地认识和理解。

我们对环境史的理解是基于生命中心论和生命共同体理念,但并不排斥其他定义和界说,例如美国环境史学界的“三个层面”说。^①我们同样“试图理解自然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可能和设置限制”,从而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何以“如今所是”?同样重视考察“人们怎样改变其所栖居的生态系统”、使地球环境逐步变成“如今所见”,探询当今生态问题“何所从来”?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视角也很重要,它有助于了解自然观念、生态意识与环境行为如何历史地相互影响。不同的是,我们更强调以生命为中心认识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探询古往今来的生生之道,诠释天地之间人、万物“一气相通”的生命联系及意义。

生态生产力标准

——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

梅雪芹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所谓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现象的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和历史人物行为的是非所做的分析和评判。历史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同时它也是历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历史评价的对象、主旨和意义等,我国史学界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很多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是要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以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事实表示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批评的态度,正确认识人类复杂、丰富、生动的历史进程,并决定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治理国家与增长智慧所取资”。^②还有学者认为,历史评价是“人类把握客观历史对

^① [美]唐纳德·沃斯特撰,侯文蕙译《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这个划分应受到了文化生态学的一定影响,为环境史学界广泛认同。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174)中期成果。

^② 张利《关于历史评价的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研究中心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7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自身意义与价值的一种观念性活动”。^①

其实, 无论怎样理解并定义, 都必须坦承, 历史评价是一种带有主观性、个体性和时代性的历史认识活动, 它涉及如何理解历史事实的作用问题。一般认为, 对于历史事实, 不同的主体会依据不同的尺度去评价其意义;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 从而形成自己的历史判断。这样, 历史事实的意义总是会不断地被重新评价, 这也是古老的历史学永葆青春活力、不断推陈出新的力量源泉。^② 以此观之, 作为 21 世纪新史学而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变迁的环境史, 不仅凸显了其研究者看待和考察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旨趣, 而且也昭示着他们意图转换视角进行历史评价的某种倾向。对于这一点, 我曾将其概括为“以自然为镜”, 并撰文解释了何谓“以自然为镜”, 也分析和总结了何能“以自然为镜”。^③

一、从“以自然为镜”到生态生产力标准

所谓“以自然为镜”, 就是“以自然的变化来检视人类文化创造的得失利弊, 臧否历史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 乃至具体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影响”。这么做的合理性归根结底是由催生环境史的“生态危机”所决定的。“世人所谓的生态危机, 其实指的是人类居住的环境也即人类的家园不适于人类自身的生存, 也危及了支撑人类生存的有机生命和无机世界, 而这种情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史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和研究生态危机或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 以探寻和理解自然变迁的人类维度。这样, 他们以自然为镜, 具体研究和深入分析历史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波及自身, 不啻是做一种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因而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合理性”。^④

现在看来, “以自然为镜”的提法以及对其内涵的厘定, 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但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或者说不够科学; 尤其是拙文并未深入、清晰地论述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中如何以自然为镜的问题, 这需要进一步专门讨论。当然, 之前我曾在《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第三部分谈及, 环境史对人类活动及其结果和意义的重新考量, 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的诞生, 并将它概括为生态生产力标准, 也注明了这一概括所受到的启发来自何处。其中说道: 生态生产力标准是笔者在品味美国环境史学者亚当·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以下简称《推土机》)^⑤一书阐述的“湿地生产力”思想, 并参考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 2001 年 6 月宣布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缩写为 MA) 工作及其部分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⑥ 不过, 由于当时我对生态生产力标准的理解和界定还很初浅, 因此在文中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什么是生态生产力, 而没有专门阐释环境史学者如何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价历史, 甚至没有讲清楚何谓生态生产力标准。

经过这些年的反复思考以及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研读, 我在此明确提出, 生态生产力标准, 是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所在。这是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出发, 立足于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而论的, 并有大量的环境史实证研究成果为证据支撑。

上文提及, 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这是它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史学界开创之初即已体现的; 迄今, 环境史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成果

① 邓京力 《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导论》,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 页。

② 参见张耕华 《历史评价能否达成一致》, 《人民日报》, 2009 年 1 月 20 日。

③ 梅雪芹 《何能“以自然为镜”? ——环境史研究中的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 夏明方、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④ 梅雪芹 《何能“以自然为镜”? ——环境史研究中的某种历史评价倾向的合理性辨析》, 夏明方、侯深主编 《生态史研究》第一辑, 第 47 页“摘要”。

⑤ [美] 亚当·罗姆著, 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⑥ 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总序》,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3 页注释 1。

可谓汗牛充栋，其初衷更加明确。在对大量环境史著述的研读和理解的基础上，我将环境史界定为“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①这一定义特别明确了环境史的基本范畴或单位，即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这又称为社会生态系统。环境史研究所进行的历史评价工作，不啻是对这一系统状态变化的评估，而这一工作的开展，是需要运用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思维工具，即生态学和生态分析方法。为此，我在重新阅读一些生态学经典作品的同时，更深入地考量之前已参照过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及其贡献，结合它来思忖在环境史研究中如何科学地开展历史评价，即评估人类生态系统变化的问题。

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启示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由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其他组织资助、发起的一项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项目，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尺度、综合性的评估项目。该项目正式启动于2001年6月，有来自世界95个国家的1360位知名学者参与其中。这项工作的开展，“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生态学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系统管理工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它是生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②毫无疑问，这项工作及其成果是我们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应当倍加重视的。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项工作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评价，它不仅有着明确的评估内容和目标，而且提供了评估尺度和方法，包括概念框架。这样，该工作的实施及其成果从理论到方法上为我们在环境史研究中如何开展历史评价点明了方向。其中，“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概念与内涵尤其值得关注，这是我进一步思考何谓生态生产力标准的科学依据之所在。

对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是这样界定的“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以及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动态、复杂的功能单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不同的收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产品，比如食物、燃料、纤维、洁净水和生物遗传资源等。调节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作用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维护空气质量、调节气候、控制侵蚀、调控人类疾病和净化水源等。文化服务是指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大脑思考、消遣娱乐和美学欣赏等方式，而使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非物质收益。支持服务是指生产其他所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所不可或缺的服务，例如初级生产、制造氧气和形成土壤等。”^③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还使用了10类系统，来汇集其全球尺度的评估结果，它们包括海洋、海滨、内陆水域、森林、旱区、岛屿、山地、极地、垦殖和城镇等，每类系统内都包含或细分出了许多生态系统。

由此可见，所谓“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收益”。这些收益被描述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等服务，其中每一项服务的具体内容都得到了阐释。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形势是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日益严重衰退，这就是生态系统的退化问题，是由于直接和间接的多种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变化以及因个人选择而引起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过度需求等。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对人类而且对其他物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人类制订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和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不仅要考虑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还要考虑人类赋予其他物种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④这样，依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及其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生态生产力标准界定为：以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损还是增益，来

① 梅雪芹 《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光明日报》，2016年8月27日，第11版。

②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译者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10页。

④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3-7页。

衡量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及其影响的做法。

鉴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目标是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的长期生产力的条件下，为采取必需的行动以提高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奠定科学基础”，它“把人类福祉作为评估的焦点，同时认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还具有内在价值，并且人们是根据对福祉和内在价值的考虑来制定关于生态系统的决策的”^① 受此启发，环境史研究在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对特定时空下的人类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和影响加以评估时，除了需要顾及人类的需求外，还需要顾及其他众多生命存在的需求。那些“四条腿的，长翅膀的，六条腿的，生根的，开花的，等等”^② 拥有和人类一样多的生存于某个地方的权利。这既符合科学的认知，也体现了环境史学的生命关怀。

三、环境史学者对生态生产力标准的运用

明确了上述标准之后，再回到环境史著述之中仔细品味，不禁发现，环境史学者在研究中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价历史，这在浩如烟海的环境史实证研究成果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对此，我曾以《推土机》为例做过分析。鉴于《推土机》一书的具体内容及其转换视角重新评价历史的情形，我在《环境史探索》丛书“总序”中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说明。在此，拟聚焦于该书论及的湿地及其生产力问题进一步探究。

从《推土机》的相关考察和论述来看，历史上美国人对湿地及其作用的认知有一个逐步深入与变化的过程，书中梳理了相关史实，这使我们了解到，一直以来在美国人心目中沼泽就是废地——这是湿地的最古老的形象；户外活动爱好者中很少有人认为洼地、沼泽和池塘拥有惊人的绚丽景色。甚至在1932年，一位杰出的资源保护者仍然贬斥佛罗里达的埃弗格莱兹大沼泽(Everglades)，认为它是一个“没有什么使人感到特别着迷，而且绝对谈不上风景如画和景色秀丽”^③的地方。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新的审美观念的兴起、生态学家有关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才普遍忧虑人类的各种活动对湿地的破坏，并充分认识到湿地的价值。1957年，生态学家保罗·埃林顿(Paul Errington)在一部题为《人与沼泽》的书中认为，沼泽的价值不仅仅是作为野鸭和麝鼠的栖息地，美国人应该认识到沼泽本身是多么有趣，多么美丽；1965年，美国资源保护主义者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在阐述湿地问题时，特别讲述了从马萨诸塞到加利福尼亚人们奋力挽救池塘、洼地和沼泽的故事。^④ 美国的湿地捍卫者们反复描述过湿地生态系统的异常丰饶性，不仅懂得“保护我国湿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丰饶的生物生产力”^⑤ 而且专门探讨过湿地生产力问题。

正是因为像这类美国人在内的很多人的不懈努力，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并不断加强对全球湿地及其资源的保护。其中相关的重要史实是，1971年2月2日来自18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湿地公约》，又称《拉姆萨尔公约》)。到1996年10月，公约第19届常委会决定，将每年2月2日定为“世界湿地日”，以正式纪念公约的诞辰。该公约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自然保护公约，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有“地球之肾”“淡水之源”和“天然物种库”之称，是迁徙水鸟的优良停歇地，也是淡水安全的生态保障地。因为湿地如此重要，所以保护湿地十分重要。

其实，像《推土机》一书一样，以生态系统的安危来看待历史上人类活动及其文明成就的得失利

① 参见张永民译，赵士洞审校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第26页。

② [美]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著，杨通进译 《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绪论》，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30页。

④ 参见[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31页。

⑤ 参见[美]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 《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33页。

弊，由此体现生态生产力标准的运用，是当代许多优秀环境史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此我们可以再举一例，用以分析环境史学者如何运用生态生产力标准开展历史评价。这个例子是环境史开创者之一、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J. 唐纳德·休斯(1932—2019)在一篇文章中讨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视角，这篇文章就是《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该文讨论的是2005年卡特里娜和丽塔两大飓风侵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缘由，这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大的灾难之一。在休斯看来，这一事件貌似自然灾害，其实它孕育于新奥尔良的长期发展中。一部新奥尔良发展史，既是人类利用土地、河流、森林、海洋等自然实体并与自然环境搏斗以建立城市、发展航运和工商业的历史，也是这些自然实体及其哺育的众多生命不断遭受侵蚀以至戕害的历史。这既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环境灾难史。^①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人类借助水利工程控制自然而建立起来的文明，由于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削弱了其自然防护能力，结果反而加剧了人类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因此，飓风造成的损失不只是取决于风暴之力，也取决于人类对土地的所作所为。而保持新奥尔良生机的努力，并不需要一味地与自然相搏，与自然合作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可以说，像休斯那样，从生态系统安危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一些貌似自然灾害的事件，已成为一种趋势。

我们认为，由于生态生产力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有机联系性，以此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各种活动，能够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并兼顾近邻和远域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历史评价标准，并不是取代而是综合并丰富了以往的历史评价标准，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判历史，这正是其历史意义所在。

不仅如此，以生态生产力标准来评估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得失利弊，其价值更在于指导和评判当下人类的各种活动，思索如何行动才利于人类整体和后代的久远利益。从当下来看，国际社会普遍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内社会积极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人心。然而对其如何检验和评判，各种标准和评价尺度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合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主旨的根本性原则标准，这就是生态生产力标准。

基于上文所述历史评价和现实考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生态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历史事实之意义的新尺度，也是考量现实活动之影响的新准则，它十分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同时也是检验和评判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周 琼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②，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

① [美]J. 唐纳德·休斯著，王玉山、梅雪芹译 《新奥尔良的发展——一部环境灾难史》，《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174)中期成果。

② 周琼 《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①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在中国环境史研究转型及学科雏形构建之际，对学术视域及其方法论进行梳理及探讨，极为必要。其中，对环境史进行精细的碎片式区域研究，与系统宏观的整体史研究的平衡及互动关系，亟待讨论及明晰，这是环境史学的建构、学科体系及话语权等层域的良好、平衡发展的诉求。史学界对“碎片化”“整体史”及其理论已有探讨，以201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刊发的13位史学大家的宏文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②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及完整性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尚未展开，这是环境史研究热热闹闹登场，却多在重弹“环境破坏论”老调，缺乏主线及宏观会通的理论架构的主因之一。借鉴其他学科的“碎片化”及整体史理论，对环境史研究及学科构建中如何处理碎片化与完整性，即区域性与整体性关系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以期裨益于环境史学的发展及深化。

一、环境史学讨论碎片与整体的必要性

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及整体性，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不是新问题，新兴的环境史学应老题新作，确立研究的层域及问题走向，明晰学科维度及逻辑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研究引入“碎片化”一词后，“碎片”因其寓意与不同领域中具体、微观的学术问题契合，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传播学等多个不同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成为与“完整性”相对而言的专有名词，特指学术研究领域及问题的多元裂化及其细小的领域和问题，内涵与“区域”“具体”接近。当该词衍伸到学科构建并与“完整性”联袂出现后，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讨论此起彼伏。争议的核心，集中在是先完成一个个具体、区域问题的碎片研究，再整合、提升为整体领域(学科)，还是先完成整体、宏观的理论体系及学科构想，在系统框架下再进行具体化、碎片化研究以丰富学科内涵等问题上。

史学研究层域的整体性，指全面、系统地阐释历史整体框架下的所有内容，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历史面相，用综合、全局的视域对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脉络问题或主流问题等进行宏观研究，概括和总结历史本质和规律，重视对历史逻辑、历史法则或历史哲学的思考。^③环境史是生物及非生物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统、有机整体，只有综合、全面地考察及研究整体环境的历史及其变迁规律，才能准确及客观地认识环境历史的全貌，纠正、补充自然环境缺失状态下不客观、不准确的社会历史。

在环境史学科建设及发展中，进行区域性的“碎片化”和宏观性的“整体史”研究，并统筹、协调二者关系的思考时，“二者不可偏废”“相互结合齐头并进”等，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路径，在实践层面却不易兼顾及做到。

中国环境史现有研究成果中，具体的、区域性研究较丰富，宏观性、学科构建性的整体史成果相对较少。区域研究多是据学者兴趣及特长开展，零碎性强，彼此间缺乏有机关联，难以形成整体特点；宏观研究缺乏对抽象性、概括性、综合性、比较性、系统性、结构性等学科建设问题的研讨，迄今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尚未问世，中国环境史学科构建长期处于蓄势待发，但却出发不力的状态中。

当务之急，应对中国环境整体史框架及其理路进行宏观思考及探讨，即运用整体史的宏观视域，对环境史作为史学分支学科必须具备的基础性问题，如环境史分期、学科体系、学术话语、史料学、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理论方法等进行系统研讨，对转换研究思路、弥补研究缺陷至关重要。地球环境原本就是个有机联系、持续发展的整体，只有从整体的视角看待地球环境及其演

^① 周琼 《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② 参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和第5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

^③ 李长莉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变,只有用大跨度、长时段等大时空的视域,才能抓住环境史的主旨和主线,全面、深入地认识环境变迁的脉络和本质。若没有整体的思考路径,就不可能深化对环境史主流和本质的认识。

在整体性视域下,“碎片”研究也不可缺失。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环境片段,相对于整体环境史来说,带有“阶段性”“区域性”特征,但碎片是构成整体必不可少的内涵和要素,尤其一些反映环境变迁及转折的关键细节,更不能缺少。然而碎片并非是随意选择、剪裁或拼接的环境片段或史料,应该全面占有、分析碎片环境史料,把握区域环境史发展的进程的特点及规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才能支撑环境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完整性与整体性的内涵同中有异,完整性与碎片、具体相对,指环境的内容、系统、关系、组织等,整体性与分散、微观、要素等相对,指环境的区域、领域、体系、学科而言“整体性”是学科层域的概念,“完整性”是研究领域的概念。比如只有研究出了陆地及水域环境变迁史的一个个碎片领域,整体性及完整性层域的地球环境史内涵才能得到体现。

二、环境史研究的区域与整体缺一不可

环境史研究的区域性与宏观整体性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在学科构建中缺一不可。

首先,区域环境史与整体环境史相互补充,不可偏废。整体环境史是学科构建及发展的目标,区域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没有具体的区域环境史的内容,就不可能建构宏观的整体环境史。而缺乏整体环境史理念及意识的区域环境对象,是孤立、狭隘的环境碎片,不可能进入整体环境史的框架,再多的区域环境碎片,也无法组成完整的中国、世界环境史。缺乏长时段宏观视角及短时期微观视角的环境史,无论其立意如何高远,研究方法及路径如何“科学”,其结论也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可能支撑中国、世界整体环境史学的体系。

无论是零星区域的碎片,还是区域中单个环境变迁的碎片,都是环境整体史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环境史的整体,都包括陆地及水域环境史两个大的碎片。陆地环境史又包括山地、荒漠、草原、森林、灌丛、草甸等环境史碎片,水域环境史也有淡水与咸水环境史碎片。每个碎片中还有更小的碎片,如淡水环境史有河流、湖泊、沼泽、湿地等碎片,咸水环境史有海洋、盐碱沼泽及其湿地等碎片。其下又有更小的碎片,如森林环境史有不同气候带植被类型环境史,气候带植被下又有不同植物群落及单种植物等的环境史;海洋环境史包括五大洋的环境史,各大洋环境史又分海洋生物、海洋污染等环境史,海洋生物环境史包括海洋动植物、微生物及病毒等的环境史,海洋动物环境史包括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环境史,无脊椎动物环境史又包括各种螺类和贝类环境史,脊椎动物环境史包括各种鱼类的环境史,再往下还有更小的碎片……。不同层级及类型、个体及群体的环境史碎片,组成一个个相对大的碎片,这些有机联系的大碎片,组成及支撑起完整的中国、世界环境的整体史。

其次,环境史碎片化研究依然有待加强。历史是由无数个层级的“碎片”组合而成的,环境变迁的历史也是如此。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碎片,主要指地理区域、历史时段及环境具体问题的碎化。现有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碎”的范围及程度,无论区域或时段、抑或具体问题的碎片量都远远不够。大部分区域环境史成果集中在江河流域区,如黄河、海河、淮河、长江及其生态史;地理区划以江南、中原(华北)及内蒙古等区域环境史研究成果居多,西北、西南、东南等区域及海洋环境史研究相对较少,新疆、西藏、东三省等区域的环境史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若以政区或自然区划的区域性碎片,无论是郡(州)县、道路、行省时期的区域,或气候带划分的区域,或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区域的碎片环境史研究,多属空白。从具体的研究对象看,除历史自然地理学、生态学或植物学等领域,对部分单一动植物分布区域史的研究涉及或包含了该物种的环境史内容,以及某类微生物寄生虫的传染性疾病环境史研究,或农史学界的农作物品种及其环境史研究外,绝大部分生物、非生物物种及其群落的环境史研究尚未进行,某类物种种群及其纲目下的类、系、科、种、群等的环境史研究也几乎未展开,虽然有部分研究案例,但相对于整体环境史所需要的内容而言,既不全

面也不充分,又遑论完整性?而不同层级、类型的环境史“碎片”中,都蕴涵着环境史整体内涵所需要的信息,因此,“碎片化”研究是中国及世界环境整体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简言之,目前环境史碎片研究的量及其地域分布、具体内容畸轻畸重,无法支撑整体环境史所需的内涵,局部到整体的转换、整合难度太大,这是整体环境史成果较少的主因之一。只有足够量的、不同区域及类型的环境史碎片,尤其个案变迁的具体过程及场景,才能建立起从碎片到整体的完整环境史,整体环境史的全貌、全过程才有可能展现,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及全球环境变迁的内在逻辑,展现不同区域、时代、环境区系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制约依赖的关系,以及不同生态群落、物种的特殊性及演变的规律性。只有由每个微观的、不同类型碎片组成的整体环境史,才是更全面、客观、完整的环境史。

再次,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理念及相关理论亟待补充及深入。“整体”环境史的概念,针对的不只是一个时代,也不只是一个政区或地更坏区划,而是历史以来的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小整体,是人类及其他物种居住生存的整个地球的大整体,亦即环境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及内容。只有对整体环境史学的框架进行系统研究,按环境史内涵及特点建构起学科的知识、理论及思想体系,才能进行有深度、有针对性的具体环境问题及其变迁史的研究。

若有一个良好的学科整体体系及框架,无论是国别、经纬度、气候带、水陆区系等地理空间区划的环境史,还是长、中、短时段,或人类历史与地质断代等时间维度的环境史;无论是具体物种的环境史,还是某生态区系的环境史,都可放到全中国乃至全球环境史的整体框架及视域中,进行不同层域的研究。只有具备了宏观、立体、全面的整体环境史思维及逻辑框架,碎片化研究才能更深入、系统,具体环境变迁史的研究才能进行更细致、准确的考量及定位。

环境整体史视域下的“碎片化”理念也需要研究,并注意区分和把握具体环境问题、环境演变史上的“细节”。环境整体史需要环境变迁的细节来补充及丰富,区域及时段、具体问题的碎片式研究也需要更丰富的细节来深化及完善。环境变迁“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叙事与现场复原的特点,对区域的碎片或整体的完整性起到关键甚至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用,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体系建构中不能忽视的内容,却往往被传统史料书写者忽略。因此,必须选择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环境“碎片”“细节”去研究,关注、还原环境史碎片的细节,但不能过于强调碎片忽视整体。“碎片”也需要进行史实、过程和结果、价值等理念的判断,对其中具体、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发现其间蕴含的环境整体史信息,才能不偏离整体史的要求,丰富整体史的理论。

第四,注意环境史碎片的相对性及整体的有限性特点。在环境整体史的视角下,碎片化的概念是相对的,不能过分强调碎片的理念而过分细化、碎化环境史的区域及时间,并非整体中的所有碎片都要一一研究。只有具备了不同时段、区域及问题的代表性环境史案例,才能成为整体史书写及构建的基础内容。如果只专注、重视具体问题,忽视了整体的宏观思考及必要条件,就会使碎片的内容成为不能互相联系的真正意义上的零碎,碎片就失去了构成整体内容的价值及意义。故碎片的内涵,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是相对的。

整体环境的概念及内涵,也是有限的。整体环境史并非是无穷大的,目前能做的研究,只能是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史。而地球作为完整的整体性环境系统,虽有其独特的丰富性及演变的规律性,却只是太阳系里的一个行星,太阳系也只是银河系的星系之一,银河系仅是宇宙中更小的星系。故中国、地球环境史的整体性是有限的,全球环境只是地球村的整体环境,不是太阳系或宇宙的整体环境。当然,即便只是面对地球村的环境,也有很多环境的侧面及维度,是人类无法企及和感知的,更是没有可能去研究的,整体环境史的概念当然也就是相对的、有限的。

第五,应对“大碎片—小整体”中的碎片化进行合理考量和界定。“碎片”及“整体”是相对的概念,从区域史视角、从环境史的整体结构及内容看,二者也是相对的。相对于大整体的碎片,在面临一些更具体、细致的环境史问题时又成为小的整体,此即“大碎片”与“小整体”的存在。区域性的环境史既是一个小整体,也是一个“大碎片”,很多更小的碎片是构成小整体的必要内核。区域性的物种、生态群落及其

区系变迁,尤其是区域性环境变迁历程及其规律各具特色,凸显着不同区域“小整体”的环境史不可复制的发展演进特点,小整体内千姿百态的各类环境要素及其变迁就成为支撑性的“碎片”而独具价值,对于更大区域的整体而言,这个小整体就成为“大碎片”,即“大碎片”与“小整体”可以互相转化。

在不同时空范围内,随着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公众思想意识、制度机制、科技等的发展,碎片及整体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导致环境演变及存在的基础发生颠覆性变化。原来极具宏观性的整体内容,在下个时段、其他区域就会成为碎片;原来不起眼的碎片,在下个时段或其他区域,又有可能成为起决定作用的整体。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小碎片能影响、改变整体环境的发展方向,整体环境也能制约、决定碎片环境的内容及存在方式。

第六,精准、合理地选择环境变迁的“碎片”,才能会通为一部部不同类型、客观唯物的环境整体史。“碎片”虽是整体史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并非所有的环境“碎片”都值得研究。环境是一切历史发生及演进的基础,其内涵最为丰富、庞杂,过往的环境变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是浩瀚纷繁、包罗万象,变迁情况也因时空不同而千差万别。大多数具体环境及生态“碎片”的演进状况,几乎是在人类没有参与甚至没有关注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很多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生存环境的产生、发展、灭绝是在人类视域外发生的,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研究的记录、遗迹及线索,此类“环境碎片”的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在整体环境史中也不可能有其位置。其他有记载、遗迹可寻的环境史碎片,也需要进行恰当、合理的选择,不是每个进入了记载的碎片都值得去研究,也不是每个环境变迁史的碎片及细节都能进入整体环境史的选择及书写范畴。

对整体环境史而言,典型性、代表性、均衡性是选择及衡量碎片的基础原则。这就要求环境史研究者、史料记录及书写者,要有一双能辨析、判定“碎片”及“整体”的慧眼。在选择具体及微观的碎片进行研究时,应选择那些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环境史片段,研究那些对环境史有较大影响的环境变迁个案,选择在生态学领域具有较大生态价值的碎片,选择那些与现实联系较紧密,如对现实环境保护和治理、生态修复有极大资鉴价值的环境要素,选择不同时期、地区或民族的环境思想、制度、伦理及生态文化的内容,选择那些对生态尤其人类生存发展有巨大影响的环境节点,选择史料丰富的水环境、土地环境、生物环境、气候环境及其下属更小的生态系统,以及那些由生物及其生存繁衍需要的不同类型的自然因素和条件,才能组成互相关联、彼此支撑的环境整体史。

三、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完整性的内在逻辑关照

区域—碎片、宏观—整体的关系,是环境史研究及学科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环境史碎片应包含什么内容,如是动植物、微生物或气候、岩石、土壤、大气、水体及其环境发展变迁与相互关系史,还是人与环境相互影响(制约及促进)史,或是区域生态系统长时段环境发展演替史,抑或是区域族群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群落、湖泊、江河、土地、多样性生物及环境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变迁史……。环境整体史及大碎片—小整体的框架如何构建、应包含什么内容等,都是整体与局部、完整与碎片应思考及解决的,是处于起步及发展中的环境史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当前全球生态共同体及当代环境整体史需要关注的领域。

以整体史思维关注及选择相应的环境史碎片,要注意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二者切入环境问题的角度和研究范围虽有差异,但却是协调统一的。碎片研究是整体构建的基础,有质、量的碎片可为整体史提供支撑,与宏观研究互补,成为关照整体史的视角和途径。个案须有微中见著的特点,符合环境整体史的目标需求,有关照宏观的问题意识或学术自觉,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困境。^①

还要注意协调学科整体发展与碎片研究共同推进,即环境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关系问题。环境史宏观研究的整体史构建,要避免“大而空”的弊端,就要处理好整体环境与碎片环境研究的平衡

^① 李长莉 《“碎片化”: 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关系。环境史学的整体史发展，需要深入系统的专题、碎片研究来推动。只有透彻研究了各领域、各层域的环境变迁史及其特点与规律，确定重大环境变迁节点及原因、结果，厘清整体环境变迁史的全貌和历史趋向，才能为整体史提供基础性依据，从总体上把握环境史发展的脉络及学科建设的目标、宗旨，达到环境史家对地球及其环境、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目的。同理，整体史又为环境各层域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从新的高度把握碎片对整体史发展的影响和推动。

在众多有价值的环境史碎片面前，“宏大叙事”“长时段视角”“现实关照情怀”的会通史观及整体环境史思维，显得极为重要。如何把不同时空下的环境碎片及其生态史侧面和代表性案例，按环境变迁的规律及内在逻辑，在宏观层面按不同层域的环境史构架，合理整合并书写出反映中国、世界环境整体变迁脉络的历史，就是当下环境史学的任务。

环境史学的整体性要具有全面、宏观的思考视域及方法，碎片化则要有具体、形象及深刻的洞察力，以客观、理性的原则，平衡并协调好学术研究及学科构建中碎片化与完整性的内在逻辑，促进环境史学的转型及发展。整体史视域及系统、动态的思维，有助于展现环境史画卷中不同的变迁面向，较好地促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碎片化史观及具体场景的复原与展现，有助于丰富整体史的内涵，提升整体史的立体感，使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更好地在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展现其优势。这不仅对环境史学，也对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及分支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及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个个环境史的碎片，折射出当代环境不同区域的现在及未来，尤其是那些决定环境变迁方向的“碎片”、“细节”，就更具资鉴价值。好的“碎片”，往往因“细节”而丰满、充实，恰当而准确的“细节”，也使“碎片”得以永恒及鲜活。一部部贯穿了全域或全球视野、具有不同主旨及思维导向的中国、全球环境整体史，不仅可以用“全球生态整体观”^①去关照并指导具体、微观的碎片环境史研究，也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全球化理念及“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对“生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及具体建设，起到基础性的支撑及积极的资鉴、促进作用。

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滕海键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以生态意识或生态理念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史的范式和趋势。以往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在经济史研究中严重忽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环境史的兴起促进了这一局面的改变。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②是一个外来词，现已为国内多数学者认同和接受。近年来，环境史在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界将焦点进一步深入到其主旨关怀与学科体系构建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上。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生态学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其他诸多相关学科。如今，历史学科的许多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全球史、社

① 周琼 《边疆历史印迹：近代化以来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问题初探》，林超民主编 《民族学评论》第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4 - 198 页。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174) 中期成果。

② 也有称“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对不同称谓学界也有不同的内涵阐释。

会史、农史等等，都出现了“生态转向”的趋势。经济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史研究要追踪学术前沿，不能不对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大势做出回应。当下经济史的传统论题有待拓展，研究范式面临着挑战，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途径，这也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以生态学意识和理念来研究经济史，可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史”。

一、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生态意识的局限

经济史是以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包括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等生产要素的状态及其组合与发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往复运动，农业、工业等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演变等等。生产和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主要媒介。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史研究侧重于生产技术和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关注的焦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科技进步与市场作用等等，而忽视经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史研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抽离出来”，或者把自然视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或外部条件来对待”，^① 这在经济学界的经济史研究中特别突出。

人是自然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② 密不可分，抛开自然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无论在历史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是片面的。传统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主体虽然是“经济人”，^③ 但偏重人的社会性而忽视其生物性。人具有生物与社会两重属性，如果只注重人的社会性而忽视其生物性，就不能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做出客观的分析。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深受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它秉承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奉守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外在于人类社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价值；不但将自然视为仅供人类开发利用的物质“资源”，而且把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视为一种脱离自然的机械运动；将“商品生产”和市场关系置于中心地位，而忽视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效应。

以往许多经济史评论文章多未提及经济史研究忽视生态的局限，说明主流经济史学界尚未充分重视和深刻认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与意义。尽管也有一些相关成果论及环境因素，但依然存在诸多局限。一种情况是把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史的分析背景和外部条件，或视为经济活动的场域，环境不但是静止不变而且是缺乏能动作用的。虽然将环境纳入经济史研究但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另一种情况是无视或忽视不同“区域间自然条件的差异性”，^④ 因而不能为经济史的演变和不同区域经济史发展的特点提供生态诠释。有很多成果在研究经济活动包括技术应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往往陷入一种线性的因果论。或者虽然将自然环境纳入经济史研究却把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的层面上，而没有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存在“脱离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⑤ 因而不能从整体上给予综合的阐释。

导致以上局限的成因有很多。首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缺乏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的缘故。如上所述，近代以来受古典经济学和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人与自然分离、以人为主、主客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认识论支配着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这一倾向连同增长至上的发展理念由西方传至东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长期地影响着经济史的研究取向。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仅变动不居而且极为复杂，生态学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生态学不仅研究自然生态系统

①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页。

② “自然的经济体系”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③ 本文认为，既往研究更多的是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

④ 简修炜 《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第1页。

⑤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2页。

的有序与和谐,也研究其混沌与无序,不了解生态学的发展演变历史,不懂得辩证的生态观,就无法深刻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其次,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作为一种与时政有重要关联的学科因避嫌“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导致的结果。再次,与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密切关联,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是一个政治目标,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论题。

二、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与理论范式

学界对于经济史研究忽视环境的局限以往有所认识,也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①早在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就主持召开了一次名为“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②专门讨论如何推进环境史视野下的经济史研究,然而迄今进展有限。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这是环境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环境史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而人与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③环境史学界格外关注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积极倡导并努力践行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发表了很多相关成果。^④国内较早倡导经济史研究生态转向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李根蟠先生,早在2000年他就曾指出,“经济史研究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长时期被人们所忽视”。^⑤李根蟠先生后来又发表专文明确提出了经济史研究的环境史视野问题,并以农史研究为例进行了理论阐释。^⑥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就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按照李根蟠先生的话说,就是运用现代生态理念来研究经济史。现代生态理念是指从现代生态学中提炼出来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这种世界观把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一种由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根据现代生态理念,“人类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⑦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意味着将人类的经济活动放入自然生态系统中去,探究自然如何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类发生互动关系。这就把“人类的经济体系”与“自然的经济体系”勾连起来,并将其置于人类—自然生态共同体中,去研究其内在结构、动力机制与功能演变。

生态理念下的经济史研究,要求将“人类的经济系统”与“自然的生态系统”统一起来,不单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传统内容,还要关注和研究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和生态效应等。李根蟠先生指出“过去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时一般局限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状况的分析,现在,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它不但包括社会生产力,而且应该包括自然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或环境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⑧

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等作为生产力的评估标准。从生态角度,对生产力的评估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标准。诸如“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等是经济史研究中的新概念和新

^① 马波在对农史研究中生态学理论的运用做了深入的分析。参见马波《农业生态经济学与农史研究》,《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第74-77、78-19页。

^② 包茂宏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国外环境史一直重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史研究,而经济史相对来说比较忽视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史。”参阅魏华仙、黄进华《“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1-112页。

^③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3页。

^④ 其中,农业与环境的关系最受关注。沃斯特特别强调“农业生态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因为农业是人类第一生计,农业与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生态关系。中国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发祥地,两大文化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学界近年来出现了从环境史角度研究两大文化系统的趋势,包括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⑤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42页。

^⑥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13页。

^⑦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3页。

^⑧ 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8页。

范畴。梅雪芹认为,生态生产力是指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并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具体是指随着时间推移,生态系统保持活力并维持其组织结构及独立性和弹性的能力。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有恢复力、活力、组织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等。^①生态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克服了以往片面、局部和单一的标准,从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评估生产力。以生态理念来研究经济史,传统经济史的核心概念“资源”也有了不同内涵。王利华指出“资源”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但具有经济利用价值,还有维持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价值,而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的。^②

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从生态角度看,这不单是商品生产和利润实现的过程,也是通过人工参与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与能量传递的过程。人类利用知识和技术开发自然资源,并将其转换为新的物质和能量以供人类消费和使用,最后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吸收和消解,如此循环往复。包括食物在内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能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在生态上是一种物质和能量转换与循环过程,这就涉及转换效率、平衡与稳定等生态问题。因此,生态视角中的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和利润实现等传统指标,更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以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深入研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的无限性的矛盾运动,以探索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最佳途径。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契合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对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做出了辩证的分析,^③指出一方面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受制于自然、靠自然过活,自然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对自然又有能动作用,通过生产和劳动,人不仅适应而且能够改造自然。马克思称自然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马克思还从哲学高度上论证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马克思有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互相制约的思想蕴含着“生态思维”和“生态史观”。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密切相关,自然并非外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人类经济活动也并非外在于自然;自然能动地参与到人类经济活动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内在于自然生态系统并受其制约。

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媒介,认为生产或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生产和劳动,从自然中获取所需产品;另一方面,又把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反馈给自然,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思想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及其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破坏。马克思认为应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物质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说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与环境史的历史观是相同的。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言,我们可以说,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思想的回归。

三、推动经济史研究生态转向的价值和意义

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生态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有着广泛的论题。王利华提出的“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和“生态—社会组织”系统的历史,若从经济史角度看,就是对生态视角下的经济史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高度抽象和概括。

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生态角度研究经济史,能够推动经济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进而促进经济史研究的创新,最终能够深化经济史研究。以生态意识和生态观来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这会成为未来“经济史学科新

① 梅雪芹 《环境史研究叙论·总序》,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② 王利华 《“资源”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辑,第35-45页。

③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1页。

的生长点”。生态学中的许多概念，如生态系统(生命及生命支持系统、自然与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共同体，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食物链与食物网，以及相应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比如整体意识、有机联系、竞争与协作、共存共生、多样性与复杂性、平衡与稳定，等等，都可以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范畴。这不仅仅是经济史研究概念范畴的变化，更是研究范式和理念上的变革，即由人的“本体主义”转向“生态主义”。将人类的经济系统放入自然生态系统之网中去，来研究和评估自然环境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更新传统的经济史观，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态经济史观。按照夏明方教授的说法，就是使我们“从教条式的唯物史观走向辩证的生态史观”。^①

以“生态史观”来研究经济史，确定无疑能够更新许多传统的认识。李根蟠先生指出“用环境史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方面，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他还讲过：“在一定条件下，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商品经济无序的发展又往往引起社会的分化、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破坏。”^②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过度相信“市场配置”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最终又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以生态视角来看，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这也是19世纪下半叶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环境问题加重并开启社会改革议程的历史背景。由此看来，对历史上市场经济的考察，需要超越“资源配置”的局限，从更为广阔的视域来看待。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然既有“适应”也有“改造”，而“改造”对自然生态系统既有破坏性一面，也有利于稳定和平衡的实例。所以，对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评估需要超越“干扰”和“破坏”的僵化认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辩证的生态经济史观。再如，以生态视角考查工业革命，我们发现工业革命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它同时也是一次能源革命。英国原本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工业的发展及家庭等对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到16世纪英国的森林资源严重短缺，出现了能源危机，这对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但英国在长期工场手工业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在18世纪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发明了能够高效利用本土丰富的煤炭资源的技术——改良蒸汽机，从而突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③由此，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另一面。

推动经济史研究的生态转向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当下全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重与生态失衡的背景下，更为迫切。经济史研究应超越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范式，将焦点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增长和市场配置等转向人类—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健康及人与自然物质循环的稳定等视域上，以“万物生之于土，万物归之于土”的生态理念，研究和探索高效能的循环经济与永续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路径。以生态理念和生态视角研究经济史，亦能为现实的经济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受制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健康与稳定，人类必须遵照生态规律来安排经济活动，经济效益取决于生态效益。应该将生产力置于生态系统中考查，研究如何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以确保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永续发展。

责任编辑：孙久龙

① 夏明方等 《生态史——历史的生态学畅想》，《光明日报》，2012年8月26日，第6版，第4页。

② 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8页。

③ 邱建群 《生态危机与能源转换——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原因之新解》，《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01-108页。